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劉勰和文心雕龍

陆侃如 牟世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劉勰和文心雕龍

陆侃如 牟世金

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刘勰和文心雕龙

陆侃如 牟世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2.5 字数 42,000

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86·34 定价: 0.20元

目 次

一、刘勰以前的文学理论	1
二、刘勰的生平和基本观点	9
刘勰的生平	9
刘勰的著作和思想	11
刘勰的文学观	16
三、刘勰的文体论和批评论	23
文体论	23
批评的标准和原理	26
作家论	30
作品论	34
四、刘勰的创作论	40
概说	40
神思(艺术构思)问题	41
体性(风格和个性)问题	48
风骨(文质并茂)问题	54
熔裁(去芜存精)问题	60
附会(安排辞义)问题	62
比兴(两种传统手法)问题	64
总术(写作方法的重要性)问题	67
五、刘勰的地位和影响	73

一、刘勰以前的文学理论

在刘勰(xié协)以前,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已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文心雕龙》的产生,正是这个传统的继续。

从先秦到魏晋间,一些学者、作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已或多或少地接触到文学的各种问题,有的还写了专篇的论著。综合起来,他们谈到的主要有下列六个问题:

第一,文学的特征问题。

人们起初对文学的特征是认识不清楚的,所以还不能把文学和别的事物区别开来。“文学”的含义由广义转向狭义的过程,就是人们对文学特征的理解由模糊渐趋明确的过程。这里,我们从“文学”含义的演变来说明一下古人对文学特征的认识的情况。

最早“文”字的意义只是指青色和赤色的配合^①,后来渐渐地用以指一般事物的修饰或文采,也用以指文化、学术,乃至于典章、制度。如《论语》中共用了三十多次“文”字,常指学术、文化,也有指文采或修

^①见《周礼·冬官考工记》:“青与赤谓之文”。

饰的，但都不是专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文”字和“学”字或“章”字连用时也是这样。先秦各学派都还没有给文学以独立的位置。不过，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件艺术品——任何其他的产品也是如此——创造一个了解艺术而且能够欣赏美的公众”^①；由于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人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逐渐清楚起来了。班固继刘向、刘歆(xīn心)父子所写的《汉书·艺文志》里，详列了西汉以前的著作。他所谓“艺”，似乎指学术性的书籍，如经、子、兵书等；而“文”则指诗和赋^②。范曄(yè叶)《后汉书》把“儒林”和“文苑”分列两传，也多少反映出东汉时文学渐渐和一般学术分家的迹象。但是这个界限在汉代还不太明确，所以扬雄《法言》、王充《论衡》等著作里边所谓“文”，常常兼有广义、狭义两种。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才着重于探讨比较狭义的文学。晋代以后兴起的“文”、“笔”之分(“文”专指文采较丰富的文艺创作，“笔”专指文辞比较朴质的学术性或政治性的应用文字)，也与文学特征的认识日益清楚有关。《文心雕龙》中虽也论及“诸子”和“史传”等等，但全书重点显然还是在于狭义的文学作品。“文学”含义前后演进的痕迹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第二，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

①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②参看《学海堂集》载刘天惠《文笔考》。

虽然古人对于文学和非文学的分界还很模糊，但对于诗歌一类作品的巨大社会作用却很早就看到了。《诗经》中某些篇的作者如尹吉甫^①、家父^②、寺人孟子^③等，都已初步意识到自己的诗篇有益于政教，因而在篇末都表达了这种信念。孔丘从维护当时统治者利益出发，更一再指出诗歌可以帮助人们提高道德品质，培养政治才能，增进学问见识^④。汉代学者继承了儒家的传统，都一致强调《诗经》和封建政教的密切关系（如《毛诗序》、郑玄《诗谱序》等）。诗歌如此，其他作品如辞赋也不例外。扬雄所以斥赋为“雕虫篆刻”（《法言·吾子》），主要因为他感到一般的赋虽然文辞华丽，但是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都不够大。班固则从正面强调赋要“抒下情而通谏喻”或“宣上德而尽忠孝”（《两都赋序》）。魏晋以后，这一观点基本上没有改变。曹丕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典论·论文》），陆机指出文学可以“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文赋》），挚虞也说创作是为了“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文章流别论》）。这些论点，明显地强调了文学应当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正如毛主席指示的：文艺批评的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⑤。

①他是《崧高》、《烝民》的作者。 ②他是《节南山》的作者。

③他是《巷伯》的作者。 ④见《论语》：《泰伯》、《子路》、《阳货》等。

⑤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七一页。

《文心雕龙》中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正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与阐述。

第三，文学和现实的关系问题。

和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相联系的是文学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文学作品和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优秀的作品不能不是现实的反映，这个问题很早也被古代文论家注意到了。他们谈论文学和现实的关系的意见，常常和谈论文学的社会作用的意见伴随在一起。古代文论家所谓文学描写现实，主要是指在作品中体现出社会环境、时代风尚、自然景物，等等。如《诗经》中的某些诗篇，基本上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所以孔丘说“诗……可以观”（《论语·阳货》），孟轲也主张“颂其诗，……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后来《礼记·乐记》和《毛诗序》里把文学和音乐都分成“治世”、“乱世”和“亡国”三种类型，便是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道理。不过，过去理论家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有时不够全面。如王充《论衡》（在《超奇篇》、《对作篇》里）和左思《三都赋序》，对作品的真实性的要求不免过于狭隘，甚至有轻视艺术加工的偏向；而陆机《文赋》又有点过于强调了自然景物和创作的关系，所以他论作文之由，除学习古书外，就只有“遵四时”而“瞻万物”了。

刘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不但指出作品和外界事物的密切关系，在外界事物中也兼顾自然景色和社会现象两个方面；而且也开始注意到

作者的情志和作品的关系了。虽然在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上，他的分析还远不是全面的，但较前人已有所提高了。

第四，内容和形式的问题。

文学艺术是为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凡是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而又强调文学和现实的密切关系的人，不能不注意到内容在作品中的主导地位，而形式只是为内容服务的。孔丘认为古代乐舞《韶》和《武》都是“尽美”的，但《韶》已达到“尽善”的境界，而《武》则“未尽善”（《论语·八佾（yì）》）。这主要是从内容着眼的。子夏问“素以为绚（xuàn）兮”一句诗的意义，孔丘答以“绘事后素”（同上），也是强调思想内容的。孟轲主张“以意逆（迎合）志”，而反对“以辞害志”（《孟子·万章》上），显然认为在理解一篇作品时，重点在于内容方面。他们在重视内容时，也不忽视形式。所以子贡反对棘子成要质不要文的偏见，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意思是，二者不应偏废。扬雄指出，“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①”（《法言·吾子》）。王充是十分重视著作内容的真实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他也理解到“文辞设施”的必要，所以既反对“华而不实”，也不赞成“实而不华”，得出“夫人有文，质乃成”的结论（《论衡·书解篇》）。自然，古代文论家中也有人误

^①“伉”是过于直率，“赋”是过于铺张，“称”是相适应，“经”是正常。

以为内容和形式绝对对立，美的形式反有损于内容的价值(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田鸠深怕“人怀其文忘其用”的话)；或过于强调了形式技巧，而相对地忽视了思想内容(如陆机《文赋》)。

在内容和形式问题上，刘勰所谓“衔华而佩实”(《征圣》)“为情而造文”(《情采》)，能在一定程度上给文意、文辞以比较适当的位置，正是儒家传统的文学思想的推衍。

第五，创作法则问题。

为了更好地解决文学的重大任务，古代的理论家很早就探讨了创作的法则，以提高作品的质量。这里当然有个由粗到精、由略到详的发展过程。孔丘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荀卿说，“君子之言，涉然(浅显)而精，俛然(平易)而类(合乎条理)”(《荀子·正名》)。这些议论尽管对后代有影响，但究竟还只是零星的意见。到《毛诗序》说明诗歌的“美刺”(歌颂与批判)的意义，《法言·吾子》提出辞赋的“丽以则”(文字华丽又有规范)的原则，《论衡·自纪篇》强调文字应接近口语而避免隐晦，于是创作手法的问题就渐渐具体化了。在这一问题上，陆机《文赋》是有空前的贡献的。它较系统地阐明了创作的各个环节：首先，它谈到作者受自然万物和古籍的启发，接着就进行构思，考虑谋篇布局；其次，它指出各种体裁的写作要点，进而论述写作上的种种利弊，以及怎样安排音节，突出警句，避免雷同，在立意

遣词上要能满足五种要求(照应、和谐、悲感、雅正、华艳);接着,它说明各人才华不同,手法亦异,其中巧妙难于尽述,而灵感的忽来忽去和文思的或快或慢,也不易掌握;最后,以创作的巨大作用作结。它诚然如刘勰所指责的,“汎论纤悉(琐碎小事)而实体未该(具备)”(《文心雕龙·总术》),但它能把艺术技巧问题从创作的角度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论述,特别是其中对构思过程作了探讨,是前人未曾作过的。刘勰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创作法则并不等同于创作手法,创作手法只是创作法则的一个内容。上面所谈古人的一些理论,大都只还是探索创作手法,而未谈到创作法则。这正是古人在文学理论上欠完备的地方。

第六,批评原则问题。

刘勰以前的文学理论家很少正面讨论文学批评原则,他们往往在评论作家作品时,阐发自己的批评标准、方法等等。先秦各个学派的思想家对几部古书大都作了评价,特别对《诗经》作了一些分析。到了汉代,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充、卫宏、王逸、郑玄等人,都对《诗经》、《楚辞》,以及当时的辞赋或乐府,作出不同的论断。例如对于《楚辞》,班固和王逸的意见便针锋相对;关于辞赋,扬雄和王充的看法也不一样。他们有时探索了古人写作的动机,司马迁认

为主要由于“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史记·自序》），而王充则认为都是为了“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论衡·对作篇》）。这样摸索了数百年之后，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曹丕的《典论·论文》。它虽然谈的很简单，但是已经能够提出并初步分析了一些问题，如文学的价值问题、文体问题（不同体裁的不同特征）、文气问题（作者的气质和作品的气势的关系）、批评的态度问题（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等等。以后，挚虞、葛洪等继续有所发挥，到刘勰便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批评理论，对作家作品作出比较广泛的评价，并对过去文学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探讨，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史观。

由此可见，到刘勰写《文心雕龙》的时候，古典文学理论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日新月异的古典文学杰作不断出现，也给刘勰提供了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经验的丰富材料。在社会发展的要求下，在创作和理论遗产的诱导下，杰出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的出现，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二、刘勰的生平和基本观点

刘勰的生平

刘勰字彦和，东莞(guān 管)莒(jǔ 举，今山东莒县)人，寄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他的生年难于考定，大约在南朝宋明帝刘彧(yù 玉)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左右^①。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刘肥封齐王时，相传刘家这一支就定居山东了。刘勰的高祖父刘爽和曾祖父刘仲道，都做过县令；祖父刘灵真，生平事迹不详。刘灵真的哥哥刘秀之，曾在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年间(公元420—422年)做过益州、郾(yǎn 影)州等地刺史和丹阳尹，死后追赠司空。刘勰的父亲刘尚做过越骑校尉，那是一种专选材力过人的人来担任的武职。刘尚死的比较早，所以刘家就中落了。刘勰从小喜爱读书，但生活贫困，以至于无力结婚，他不得不和佛教徒僧祐一起生活在寺庙里，达十余年之久。

^①关于刘勰的生年，史无明文；一般都是从《文心雕龙》成书时上推三十多年。这里采用的是范文澜的假定（见《文心雕龙注》卷十《序志》注六）。也有人认为成书在499年，诞生在469年。

僧祐本姓俞，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兼宗教家，不但精通佛教理论，而且也读过不少儒家经典。在南朝齐武帝萧赜(zé)永明中(公元488年前后)，僧祐奉命到江南讲佛学，并修建庙宇，搜校佛书。刘勰这时大约二十多岁，除协助僧祐整理藏经外，还认真学习儒家书籍，可能也读了历代不少文学作品。

《文心雕龙》的完成，大约在南齐末年(公元499—502年间)。因为在《时序》篇中历述唐虞以来的文学，只至齐代止，而且对齐代帝王赞扬备至，显然那时梁武帝萧衍还没有称帝。书成时，他大约三十六七岁，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地位，所以一般人并不知道他。《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很重视自己的这部著作，想请沈约鉴定一下。那时沈约正做着大官，刘勰没有机会和他见面，所以亲自背负着书稿，等候沈约出门，到车前求见。沈约读了这部书稿，十分赞赏。沈约是齐梁间的著名作家，在萧衍称帝前已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因而他的称许能在当时社会上起一定的影响。但《文心雕龙》为后代所推重，则主要由于它自身的价值。

《文心雕龙》写成后不久，由于刘勰在文坛上的声誉日益增长，也可能由于沈约或僧祐的关系，他开始做官。那时南朝已由齐代换为梁代，他也将近四十岁了。

刘勰先以“奉朝请”起家，那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官阶很低，但是当时做官的却须先经过这一

级^①。梁武帝萧衍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左右,临川王萧宏进号中军将军,刘勰做宏的记室,主管文书。次年十月宏北伐,他改任车骑仓曹参军,管理粮食和武器的出入账目。这时的车骑将军是湘州刺史夏侯详^②。详于六年六月改任尚书右仆射,刘勰可能在这时调到太末(今浙江龙游)做县令^③。十年,南康郡王萧绩进号仁威将军,他做绩的记室。若干年后,他兼任昭明太子萧统宫中的通事舍人,主管章奏,后来又任步兵校尉,是警卫方面的工作。

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五月,僧祐死。刘勰早就受命与僧智等三十人一起在定林寺里编撰《众经要抄》^④。不久,他又受命与慧震同在寺里整理佛经。后来他就在寺里出家,改名慧地。不满一年,他去世了,时间大约在梁武帝萧衍普通初年(公元520年或稍后)^⑤。

刘勰的著作和思想

刘勰的著作主要是《文心雕龙》。全书共五十

①当时百官定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奉朝请”为第二班(参看《资治通鉴》第一四七卷天监七年及《隋书·百官志》)。②参看《梁书·夏侯详传》及万斯同《梁将相大臣年表》。湘州治在今湖北黄陂。③《梁书·刘勰传》说他“政有清绩”,不知其详。④参看《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和卷五《僧旻传》,那时刘勰正在做临川王记室。⑤刘勰卒年只能推测,说法也不一,有人假定在532年(即萧统死后一年)。也有人假定在522年前后。这里采用的是范文澜的假定。

篇，约三万七八千字。从第一篇《原道》到第四篇《正纬》是全书的总论，首先提出“文原于道”的原则，其次说明写作必须学习儒家圣贤的经典，最后指出“纬书”^①的不可信。因为过去曾有人以“纬”配“经”，所以不能不予以纠正。

从第五篇《辨骚》到第二十五篇《书记》，分别讨论了骚、诗、乐府、赋等三十五种文体，诠释每种文体的名称和特征，说明它们的起源和演变，评论作家作品的优缺点，指出写作的方法。这是文体论的探讨，也是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为建立自己的理论打下稳固的基础。

从第二十六篇《神思》到第四十九篇《程器》，深入地分析了有关创作和批评的重要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关于这两方面的理论，是全书中最主要的部分。

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或跋，说明这部书的名称、写作的动机、全书的基本内容、对过去一些文论的意见、对后代读者的期望，等等。

刘勰所以要写这部书，一方面因为他重视文学的作用，深信文学作品可以阐明儒学，有益政教；一方面也因为当时不少作家走上了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歧途，他要在这部书中纠正那种不良倾向。他认为写作应以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书做典范，其次应学习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他对汉魏某些

① 纬书是汉代人假托经义来讲瑞应的书。

辞赋已表示不满，至于晋宋以后作品则感到缺点更多。可惜过去评论家如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等，对它们都未能作全面的探讨，有时又抓不住要点。所以 he 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总结历代创作的经验，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来指导作家与评论家。

除这部著作外，刘勰还写了一些有关佛教的文章，如《钟山定林上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僧柔法师碑铭》，还有为僧祐、超辩等人所作的碑文，以及请祭祀改用蔬果的表文等等，现在都失传了。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只有《梁建安王造剎(shàn 汕)山石城寺石像碑》及《灭惑论》两篇^①。前者二千多字，内容除叙述寺庙历史外，还歌颂了佛教，写在《文心雕龙》之后十多年(公元 516 年)。后者约三千多字，内容是根据佛理来驳斥道教的论点，写作年代难定，但总在僧祐去世以前。两篇写作期大体相近。

由此可见，刘勰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有儒家的思想成分，也有佛教的思想成分。

他在《文心雕龙·序志》里说：

子生七龄，乃梦采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龀立（三十多岁），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

^①《碑》见《艺文类聚》第七十六卷及《会稽掇英总集》第十六卷，《论》见《宏明集》第八卷。